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姚开建 贾根良

马克思主义 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 的结构与变迁

Makesizhuyi Jingjiweiji he Zhouqililun de Jieqou yu Bianqian

刘明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 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

刘明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刘明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0685-4

I. 马…

II. 刘…

III. ①经济危机-研究②经济周期论-理论研究

IV. F039 F0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9898 号

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姚开建 贾根良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

刘明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3.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6 000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迎来了大机器生产时代。它的到来，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这种发展势头却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资产阶级越来越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结果使它不得不遭受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①。

从 1788 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 2008 年的二百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总共发生过 28 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其中，1825 年之前发生过 6 次，即 1788 年、1793 年、1797 年、1810 年、1815 年、1819 年危机，由于这一时期的危机发生在英国的某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2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较小，而且危机的发生频率不规则，间隔时间最长为 13 年，最短为 4 年，所以应当将其称作局部的、地方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早期形式，还不能算作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 1825 到 1929 年的一百多年时间内，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 13 次经济危机，即 1825 年、1836 年、1847 年、1857 年、1866 年、1873 年、1882 年、1890 年、1900 年、1907 年、1914 年、1921 年、1929 年危机，这一时期的危机基本上是在自发状态下周期性发生、发展，不仅其频率比较规则，而且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呈现出逐渐加剧的趋势。这一时期的危机属于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典型形式。从 1937 年到 2008 年，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 9 次经济危机，即 1937 年、1948 年、1957 年、1969 年、1973 年、1979 年、1990 年、1997 年、2008 年危机，与前一时期的危机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危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使再生产周期四个阶段的交替进程逐渐趋于模糊；危机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交错出现；周期有缩短的趋势；出现了滞胀局面。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由于政府采取了尽量少干预经济的政策，不仅使危机的频率又一次恢复到十年左右，危机的程度也逐渐加剧，且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危机逐渐趋向于高度的同期性。

19 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 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 世纪 20 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 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19 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 19 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



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 20 世纪以来，这样的一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 70 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 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变，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

回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二百多年来的表现，尽管每次危机都各具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属性与本质特征是相同的。这就是：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伴侣，是资本主义无法医治的痼疾，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只能做到缓解危机，而无法做到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

二

马克思在他有生之年经历过 7 次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中，1825 年、1836 年危机发生时，马克思或者是因为年纪小，或者是因为研究工作还尚未转到经济领域，没有对这两次危机进行跟踪研究。马克思亲身经历了 1847 年、1857 年、1866 年、1873 年和 1882 年危机的初期。由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早于马克思，所以在马克思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恩格斯就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某些规律，并且准确地预言了 1847 年危机是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更加猛烈、更加持久的危机。^①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积累，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够在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实质、后果、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结论。从 1849 年开始，随着马克思的研究活动转入经济领域，详细地研究了经济危机史，吸收了他同时

^① 例如，恩格斯已经发现危机在本质上是工业生产过剩危机，具有周期性，周期的长度为 5~6 年，危机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 卷，367~37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代所有经济危机文献，做了大量有关经济危机问题的摘录和笔记，细致地回顾了1825年以来历次危机的细节，极其详尽地概括了工业周期中的一次危机的经过，区分了一次危机的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个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投机过剩和股票危机、信贷危机和货币市场危机、商业危机本身和金融危机、对外贸易危机和黄金外流、普遍的商业危机和银行危机。），并试图探究货币、信用和危机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为了检验以往的研究成果，继续发展和完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十分注意从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而且还密切注视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他们对1857年经济危机给予了高度关注，进行了多年跟踪研究，不仅早在大危机爆发前一年就预见到它的来临，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反映。他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就包含有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成了现实性。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不仅表现了商品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而且还更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发展造成的许多限制——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并造成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的发展潜伏着的危机的可能性也就逐步发展为现实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在于某些人为的偶然因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创造性地揭示了固定资本更新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的根本原因。

三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不仅再次深入批判了萨伊、李嘉图等人否认资本主义存在普遍经济危机的错误观点，而且也指出了西斯蒙第和其他一些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问题上的严重缺陷。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关危机理论的批判，进一步



阐述和发展了危机理论，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展开后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经济关系的对立和统一的运动。经济的正常运转意味着它的内在要素处于统一的状态，一旦这些要素彼此分离和彼此独立，其发展的趋势就是使这些已经彼此分离和独立的因素趋于统一，而这种统一的过程就是危机。这种对立与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运动过程，如果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么，这个运动同样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由于它们有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因素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①“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社会资本再生产比例关系周期性失衡后的周期性强制恢复，因为“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③虽然马克思对这些结论的系统阐述尚未充分展开，但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内容。

1863年以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手稿中，按原先的方法论原则，对经济危机从潜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逐步转化的过程作了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对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分析中，探讨了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在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证明了这些矛盾和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5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② 同上书，586页。

^③ 同上书，562页。



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积累规律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历史趋势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① 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通过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得到缓解。但是，“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② 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只能依靠对这种生产力本身的暴力破坏才能继续前进时，这一社会肯定无法逃脱最后崩溃的历史命运。

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对1866年、1873年、1882年危机也进行过跟踪研究，只是相对于1857年危机而言，他没有给予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予以高度关注，其中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即他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根源、特征和传导过程等基本要素，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和运动的一般规律，继续跟踪观察危机一方面是为了检验已经创立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为了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以便继续完善理论。事实上，由于马克思创造了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使他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预言家，他曾较为准确地预测过他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危机，并且在危机发生之前就能够对危机将要发生的领域和程度做出某些符合实际的预言。

在马克思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伴有股份制、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福利国家制度、经济关系的国际调节等逐步推进的局部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经历了由逐渐加剧到逐渐缓和的转变，出现了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② 同上书，277~278页。



交错、再生产各阶段交替进程模糊、生产力过剩和大量失业同时并存、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交织并存等新特征。面对这些变化，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的来说做到了与时俱进，在继承发扬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理论创新，对现实经济危机特别是 30 年代大萧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不仅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提出了比例失调论、生产与消费矛盾论、崩溃论、消费不足论、投资过度论、长波论等学说，以及经济危机的教科书分析模型。学者们在经济危机的原因、传导机制、经济周期长度、周期各阶段特征、中间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滞胀现象等领域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当然，一些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声音也经常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引起过数次世界范围的激烈争论。

四

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行列中，希法亭承认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但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垄断组织作用的加强，出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得以延伸，危机得以减缓或至少是抑制危机对工人的消极影响。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对当时盛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思潮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由于基本矛盾具体地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表现为对这两对矛盾的分析，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苏联学者——例如瓦尔加、门德尔逊、库钦斯基等人——都采用这种模型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果形成了一个结构相对稳定，很适合为战争和革命目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模型，并且在 50 年代被教科书所吸收，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标准模型。随着历史的发展，对经济危机起反作用的因素陆续出现，与此相适应，逐渐形成了教科书模型或基本矛盾模型的改进型。分析的侧重点也由对基本矛盾的分析逐渐转向对基本矛盾与起反作用因素之间矛盾的分析，



分析方法也更加多样化，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领域，使模型不仅适合于对本质关系的分析，还适合于对经济运行的分析。

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因素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除了学术争鸣的因素之外，事实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视野，属于有益的探索。他们中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指责明显地犯了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同的错误——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论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这样的理论是不值得讨论的，因为它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进行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比较现有研究长波现象的文献，尽管分歧难以弥合，但有两点长处值得肯定：一是运用统计数据、统计方法以及计算机手段证明了长波现象的存在，表明长波现象是实证分析的结果；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长波现象存在的原因，尽管带有学术争鸣的色彩，但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现实经济关系的结果。长波理论尽管尚未成熟，但它已成为许多学者解释世界经济发展史、预测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有效工具，许多国家的战略决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受到了长波理论的影响。

五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的探讨开始于 30 年代大萧条之后。尽管他们的研究活动曾一度受到来自苏联经济学说的深刻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理论创新冲动，但是他们还是对经济危机和周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过广泛的研究和学术争鸣，出版、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其中不乏有分量、有突破意义的成果。

中国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历程和探索过的重大问题表明，他们基本上做到了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能与时俱进，积极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变化，对新现象、新特征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既能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一般原理的深入研究，又能够坚持推动对新的重大问题的学术争鸣；既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能积极创新、引



进和吸收新的科学方法，提升理论分析和论证能力。

中国学者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把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研究。由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波动规律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一开始就定位于驾驭周期，带有很强的服务于实践的特征。在研究工作启动时，学者们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把方法论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在坚持矛盾分析法的同时，积极引进现代统计、计量、数量等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分析能力和解释经济周期的能力，因而也促进了理论创新。在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现在，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路径，即方法研究→波动描述→波动解释→理论构造→现实检测→修改方法→修正对波动的解释及其分析理论。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成就已经成为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据，已经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

六

本著作的写作起因于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作者最初的写作动机只是想为分析和论证工作概括出一个更为全面、有效、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分析模型，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仅仅概括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分析模型就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至于这个模型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在马克思之后的发展和演变情况如何，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研究工作显然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为了有利于自己搞清楚问题，也为了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作者决定以专题进行研究和写作，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危机理论入手，向前追溯它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古典经济危机理论分析模型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包括了两个专题。此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经济思想和分析模型演变的历史顺序逐渐展开，直到对中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的回顾与反思，这部分内容又涉及了多个专题。在研究和写作这些专题的过程中，作者的近期目标是为了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远期目标是汇集成专门的著作，所以内容的某些部分已经公开发



表。由于这样的原因，本著作各章就成了一些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内容上具有相对完整性的专题性论文，这样的结构既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长处在于读者可以从某个专题中较为全面地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不足在于有些章节之间存在少量内容上的交叉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本著作虽然以专题形式构筑理论体系，但并未影响它的逻辑结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它自始至终遵循的原则，章节展开保持了顺畅的衔接关系。

作者相信，选择这样的研究课题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大，但研究成果如何心中没底。由于作者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很多，真诚地希望读者批评。



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代总序)

贾根良 姚开建

在我们看来，作为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相比，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忽视，作为最需要财力支持的学科却得到了最少甚至没有得到资助，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人才流失也异常严重，一些高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几乎陷入停顿状态，目前该学科在全国普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状态。

如何振兴经济思想史研究？这是我国经济学发展中不能再忽视和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重大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首先讨论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然后论述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重要意义，最后则扼要讨论贾根良所提出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设想。当然，这些论述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属于一家之言，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指正。

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要自主创新

让我们先从本丛书第一本著作所研究的“经济学



改革国际运动”谈起，这是一种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运动，英文原名为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英文中，“autistic”是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具有“自封闭的”、“幻想的”或“虚构的”的含义，法国学生在2000年发起这个运动时，使用这个术语指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自封闭的经济学”，对西方国家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学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但是，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学学生的这种造反运动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却兴起了一股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潮流。如果阅读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相关文献，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教条主义不过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种教条主义的本质都在于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要求将这一范式的学术主张和实践上升为整个学科必须遵奉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并将其贯彻到经济学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从而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体制上锁定整个学科。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对“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提出的问题加以深思和考察，而不能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如果在没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和危机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学类型的情况下，固执地按照已经接受的新古典范式继续大规模地推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全盘西方主流经济学化”，无疑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们非常信奉以反思或省察为第一要义的理性概念，据说最近又开始了对信念和认知模式的前沿性研究。但是，他们实在应该首先研究一下自己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家们的理性、信念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由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世界观所构成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简要考察。

经济学家们很难否认哲学基础对经济学范式的决定性影响，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作为现代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先驱也是得到公认的。然而，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来说，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曾写过一段著名的话，“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



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式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Georgescu-Roegen, N., 1971）。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仍坚持以机械还原论为基础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世界观，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陈旧的世界观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上越来越显示出其严重的缺陷。

正是因为建立在上述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基础之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视为普适的、甚至唯一的科学方法，从而建立起由此所支配的单一学术规范。但是，通过对其科学哲学基础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封闭系统的假定还是内部相容性的标准上，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都因为其自身的缺陷而无法保证数学方法的现实相关性。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经济学日益远离现实，也远离科学，因为科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的关注。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取决于数学形式化的观点，支持经济学改革运动的法国经济学家们指出，将科学与使用数学联系起来是幼稚的和荒谬的，将关于经济学科学地位的争论局限在使用数学与否这个问题上是一种欺骗（爱德华·富布鲁克，2004）。

因此，长期以来，虽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数学形式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制度化，它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不能根除的痼疾。霍奇逊在《20 世纪的经济学：失去机会的世纪》中谈到这种状况时，曾经非常悲观地指出，形式主义的做法，既不需要经济学史的知识，甚至也不需要了解现实经济的历史。形式主义不断成长并自我强化，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如果经济学还没有死亡，也是正在死去。经济学不管是在苟延残喘，还是已病入膏肓，在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框架之内，其复原的希望极为渺茫（霍奇逊，1999）。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首先，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直觉意识却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的世界观相契合，它对实在性质的认识也免除了数学形式主义的科学主义思维。然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强烈的门户之见，往往高估自身而贬低别派，甚至也存在对本流派思想传统的教条主义，如后凯



恩斯学派代表人物保罗·戴维森就宣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是对新古典理论唯一真正的替代。其次，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对经济问题的浓厚兴趣正在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商学院、社会学系等其他院系或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许多学者正在从事以现实为导向、面向公众的经济学研究，其优秀研究成果主要见诸于商学院、技术政策、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之类的出版物，或者通过出书来发表，鲜见于权威经济学期刊（霍奇逊，1999）。但是，这些在经济学院系之外所从事的经济问题研究往往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承认为正式的经济学研究。

然而，上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大都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广泛涌动的演化科学新范式这种潜在潮流的组成部分。演化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却锁定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而不能自拔。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并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因为经济学思想史的观察证实了进化生物学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新物种的形成和演化要远离原物种数量巨大和竞争激烈的地区，一种新型的经济学最有可能在原有经济学范式还没有锁定的、处于半边缘的外围地区通过“间断平衡”的方式得到更彻底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重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覆辙，并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吸收有用成果但又避免其门户之见，同时把西方社会科学界在经济学院系之外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纳入到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之中，这是中国经济学自主创新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并非只是来自于对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大趋势的观察，它更主要的是起源于中国问题意识。目前，有关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仍是相当不发达的，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对此做出重要贡献。虽然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正如我国近几年所遭遇的许多严重的困境所警示的，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功，而我们目前对过去成功的原因仍缺乏更深入的理解。我国目前所遭遇的许多严重困境说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外资和外需、对民族产业和广大劳动者缺乏有效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在面临新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的挑战下，中国